

輯刊研究文學古古典

曾永義主編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七編第2冊

建安文學探微

施建軍著

古興文數研究輯刊

七 編

曾永義 主編

第2冊

建安文學探微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建安文學探微／施建軍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102〕

序 4+ 目 2+254 頁；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七編；第 2 冊)

ISBN：978-986-322-091-6 (精裝)

1. 三國文學 2. 文學評論

820.8

102001624

ISBN-978-986-322-091-6



9 789863 220916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七編 第二冊

ISBN：978-986-322-091-6

建安文學探微

作　　者 施建軍

主　　編 曾永義

總編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3 月

定　　價 七編 16 冊 (精裝) 新台幣 2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建安文學探微

施建軍 著

作者簡介

施建軍，河南汝南人，鄭州大學文學碩士，復旦大學文學博士，先後師從俞紹初、楊明先生攻讀中國古典文獻學和中國古代文學，主要研究方向為漢魏六朝文學與文學批評，現為上海市公務員。

提 要

建安文學研究是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一大熱點，論著繁多，要寫出新意勢必很難。作者知難而進，抓住研究者往往不太注意，不太注重，或者論述雖多但不夠深刻，不夠準確的問題和細節，探幽發微，新見迭出。

本書以論題為綱，以相關批評和研究為目，對魏晉到明清的建安文學批評史料和二十世紀的建安文學研究成果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梳理，實為古往今來的建安文學接受史或研究史，其間往往不乏新意。如作者認為，辭賦仍然是建安時期的主流文體，大賦創作也並不寂寞；所謂「建安體」，主要體現在「梗概而多氣」，「漸見作用之迹」，「雖浸尚華靡，而淳樸餘風，隱約尚在」。諸如此類，都有助於我們更加客觀和深入地理解建安文學的成就和特色。

對數量眾多但一度被忽略、評價不高的三曹遊仙詩，作者詳加探討，涉及創作淵源、地位價值、創作時間、思想意蘊、曹氏父子究竟信不信神仙等諸多問題。

作者重新審視了曹操與建安諸文士之間的關係，以雄辯的史實說明，曹操不會太重視、更不會重用建安諸文士，諸文士志不得伸的不平之鳴不時發乎詩文。

曹氏兄弟爭嗣這一歷史事件對建安文學的影響非同尋常。無論是對爭嗣經過的追尋還是對其影響的探究，本書都顯得更加細緻深入，也更接近事件的本源。

序

楊 明

施建軍博士曾從我問學，如今他的著作《建安文學探微》即將出版，我由衷地感到高興。這倒不僅僅是由於師生之誼，主要還是因為這部著作具有學術價值，能帶給讀者不少啓發。

本書大致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梳理自古迄今人們對於建安文學的論述，並且加以評說，那可以說是「批評之批評」；二是關於建安文學若干問題的再認識，主要是有關三曹遊仙詩、曹操與當時文士的關係和曹丕、曹植爭嗣三個問題。作者無意於對建安文學作全面的論述——那樣的著作已經夠多，而其所論者，都是在深入研讀原始資料的過程中有所悟解、有所創獲的內容，都是別人未曾言或言之未詳的自己的心得。

舉例來說，所謂風骨、建安風骨，幾乎是「言家口實」，凡談論建安文學者沒有不加以討論的。現代的學者往往着眼於那些反映社會動亂、民生疾苦的作品，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王粲的《七哀》，曹植的《送應氏》、《野田黃雀行》，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之類，認為那些詩作慷慨蒼涼，是所謂建安風骨的典型表現。同時學者們多認為風骨之有無與作品的內容密切相關，充實而富於積極意義的內容方才談得上具備風骨。但是本書的見解不同。作者注意到《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在《明詩》篇裏對建安詩歌內容的概括，不是什麼反映動亂民瘼，而是「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其着眼點與今人頗為不同。劉勰是稱賞建安風骨的，他所概括的這些內容的詩歌，顯然應該是他認為具有風骨的。由此可知，劉勰心目中的風骨，與今天許多學者所說的風骨，並不一致。今人使用傳統用語時加進自己的意思，也未嘗不可，但同時應該理清古人的原意，才不至於誤讀古書。

那麼，劉勰那個時代所謂的建安風骨，究竟是何含義呢？本書有《所謂「建安體」》一節，寫得頗為精采。作者列舉了建安作者詩文里許多言及「慷慨」的書證，聯繫《文心雕龍·時序》論建安文學所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的話，發表意見道：

慷慨常常由悲情激發。這悲情，可以是憂世不治之悲、壯志難酬之悲，也可以是時不我待之悲、樂極哀來之悲。其實，是何種悲情，甚至是不是悲情激發了他們的慷慨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們騁才使氣、慷慨悲歌的狀態，這種狀態使他們的作品呈現出鮮明爽朗、剛健有力的體格風貌。這種體格風貌，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篇稱為「梗概而多氣」，鍾嶸《詩品序》稱為「建安風力」，嚴羽《滄浪詩話·詩評》稱為「建安風骨」。稱謂不同，但意思相近。（着重點為筆者所加）

這段話，我以為說得很好。它啟發讀者：風骨乃是指說作品的風貌，與作品的內容並無直接的關係。也就是說，不同內容的作品都可能具有風骨。風骨是就作品的風貌而言，不是指作品的內容而言。風骨是我國古代文學批評中的重要概念。關於《文心雕龍·風骨》的涵義，我國學術界曾有漫長而日漸深入的討論。王運熙先生早在半個世紀之前，就發表了很好的意見。施建軍博士於建安詩文饋寢有年，體會真切，因此他關於風骨的理解也是正確的。

關於三曹遊仙詩以及曹操對諸文士的態度、曹氏兄弟的爭嗣，本書的論述也頗引人入勝。作者閱讀史料用心細密，每能讀書得間，提出與舊說不同的見解，而合情合理，令人信服。有的學者認為丕、植兄弟立嗣之爭起自建安十三年，本書以為不確。作者運用不少資料，證明至少在建安十六年之前，曹植在曹操心目中的分量，還不足以與曹丕等量齊觀；包括曹植本人在內，人們是認定了曹丕作為繼承人的地位的，曹丕本人心中也並無危機感。作者舉出一些例子，頗有意思：曹植早期所作詩文，稱曹丕為主人、公子、「我君」，讚美其「高義」、「仁恩」過於周公。諸文士也同樣如此。而曹丕也儼然以周公自喻。作者認為，由此可見丕、植二人此時的關係和在人們心中的地位。這些詩文裏，曹植的《離思賦》乃建安十六年從曹操西征時憶念居鄴留守的曹丕而作，賦中有「願我君之自愛，為皇朝而保己之語」，注家多解「我君」為曹操。本書指出據文意應是曹丕。那麼可見此時曹植也還並無爭嗣之想。在這裡，對「我君」一語的理解頗為關鍵。由此也可見出建軍讀書之認

真。關於丕、植爭鬥中諸文士的態度，本書也梳理史料，敘述得細緻入微。如吳質「善處其兄弟之間」的圓滑，就令人覺得躍然紙上。

書中勝義尚多。如論歷代對建安作家作品的評價，頗具歷史的眼光，同中見異，異中見同，且多探討歷代評價變遷的思想學術、審美取向等背景狀況。又如論劉禎詩，認為用語多重複，才思匱乏。凡此都是具有心得之言。有關曹植某些遊仙詩的寫作年代、主旨的分析，讀來也覺比舊說來得合理。

本書體現的研究方法、寫作態度也值得重視。首先，作者將文學批評與作品的鑒賞、闡釋聯繫起來，打成一片，相互印證。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我國古代文學批評的實踐性很強，論者往往結合具體作品發表見解，其理論多從作品的寫作和鑒賞中來，因此若脫離對於具體作品的理解、分析，單純就理論談理論，那是很容易看似頭頭是道、其實言不及義、郢書燕說的。前輩學者強調讀《文心雕龍》須結合閱讀《文選》，便是為此。再者，本書看起來似乎沒有完整的系統，那是由於作者有意要避開學界已有定論的內容，集中表述自己的心得。在我看來學術研究正當如此。說得誇張一點，一條具有真知灼見的、能為學術提供一些新東西的小小注釋，其價值是勝過面面俱到、看起來「體系」完整，實際上人云亦云的大部頭「著作」的。（當然，普及型讀物另作別論。）王運熙先生曾說：「我一向認為，單篇的富有新意的論文，其學術價值往往會超過完整而有系統的書籍，因為後者儘管也會有不少新意，但為了照顧全面和系統，不免要講述不少陳言，這是限於書的體例，不得不然。」王先生還是就「有不少新意」、但不得不照顧全面系統的著作而言；至於時下某些為了追求學術以外的目的而疊床架屋的「著作」，那就只能說是災梨禍棗了。

相信施建軍博士這本書的出版，對於中古文學的研究將有所裨益。

序於 2012 年初秋，黃浦江畔



目

次

序（楊明）	
引言	1
第一章 建安文學批評史論（上）	5
第一節 曹丕建安文學批評新探	5
第二節 劉勰建安文學批評散論	11
第三節 唐宋時期的建安文學整體觀	25
第四節 明清時期建安文學批評的特色	37
第二章 建安文學批評史論（下）	49
第一節 三曹評價的歷史變遷	49
第二節 劉楨、王粲之論	67
第三節 所謂「建安體」	84
第三章 二十世紀建安文學研究述略	97
第一節 百年研究概述	97
第二節 建安文學通論	102
第三節 三曹、七子及其他作家研究	118
第四章 曹氏父子的遊仙詩	137
第一節 三曹之前的神仙思想和遊仙詩作	137
第二節 三曹都是無仙論者	143
第三節 三曹遊仙詩的思想意蘊	151

第五章	曹操與建安諸文士——兼談曹操用人	165
第一節	「曷嘗有尺寸憐才之意」？（一）	165
第二節	「曷嘗有尺寸憐才之意」？（二）	180
第三節	不被重視和重用的背後	185
第四節	不平則鳴：諸文士的哀歌	190
第六章	曹氏兄弟爭嗣本末及其影響（上）	195
第一節	建安十六年（211）前	195
第二節	明爭暗鬥	198
第三節	遲遲才見分曉	205
第七章	曹氏兄弟爭嗣本末及其影響（下）	217
第一節	非同尋常的影響（一）——命運被這樣決定：吳質、丁儀等等	217
第二節	非同尋常的影響（二）——對黃初、太和年間曹植命運和經歷的考述，兼談曹魏諸侯的處境	222
第三節	非同尋常的影響（三）——被改寫的後期建安文學創作	233
第四節	非同尋常的影響（四）——身後是非及其它	242
主要參考書目		249
後記		253

引　言

在中國文學史上，建安文學的塊頭並不大，但響當當、沉甸甸。建安是東漢獻帝劉協的年號，而建安文學不僅涵蓋建安時期（196～220），還至少向上追溯到漢靈帝中平元年（184），向下延續到魏明帝太和六年（232），大約有半個世紀之久，在時間斷限上比較特殊。這一點還有得比，如所謂正始（魏齊王曹芳的年號）文學，也不僅僅是限於正始時期（240～248）。建安文學最為特殊的，是它在文學史分期上，總是被視為曹魏文學而不是東漢文學。這一點正始文學就沒得比了，它總是被視為曹魏文學而不是西晉文學。建安時期是曹氏逐漸篡漢的時期，正始時期是司馬氏逐漸篡魏的時期，二者情形相似。看來，政在曹氏並不是把建安時期的文學劃歸到曹魏文學的決定性因素。決定性因素是什麼？是文在曹氏：建安時期文學的繁榮是曹氏造就的，曹氏父子本身又是那個時期文學創作的中堅，其他重要的建安文人也大多是他們的屬下。這是正始時期主政的司馬氏或是曾經權傾朝野繼而改朝換代的其他什麼氏所望塵莫及的。

對建安文學的批評，從建安時期就已經開始。在長達一千六七百年的時間裏，古人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建安文學批評資料，其中一部分收錄在河北師範學院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組編撰的《三曹資料彙編》裏。它們的涉及面很廣，有對建安文學的宏觀認識，也有對具體作家和作品的評論。在今人的論著中，它們常常出現，但常常是以隻言片語、零零星星的面目出現。王巍先生的《建安文學研究史論》則對之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梳理。本書的第一章、第二章，就是在繼續進行這項梳理工作。相對於建安文學研究史論，我更願意稱之為建安文學批評史論，古人那些雖略顯感性、零碎而又往往言簡意賅

的批評大多不似現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用批評的字眼去稱呼它們，也許更符合實際。另外，本人的做法也不太一樣。在論述的體例上，儘管也有以人為綱的，但主要是以論題為綱、以相關批評為目。例如同樣是對建安文學的批評，魏晉南北朝時期、唐宋時期和明清時期就各有側重，也各有特色。又如在對三曹的評價這個論題上，我們只要將歷代的相關批評整合在一起，就會發現不同的歷史時期對他們的評價相去甚遠。追究造成這種巨大反差的原因，有個人的因素，更有時代的因素，從中正可窺見文學審美趣味和批評標準的歷史變遷，這比簡單地去斷定孰是孰非似乎更有意味。

現代意義上的建安文學研究始於二十世紀。在這個世紀裏，古典文學研究取得了不可以道里計的長足發展。作為古典文學研究中的一大熱點，建安文學研究更是碩果累累，儘管爛果子、壞果子也是比比皆是。本書的第三章，對二十世紀的建安文學研究進行了粗淺的評述，旨在儘量全面地展示重要的、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鑒往知來，也使自己對自己所從事的研究課題目前達到了一個什麼樣的研究高度做到心中有數。形勢上分門別類，以引述為主，間或加上自己的按斷。

三曹遊仙詩數量眾多，意義和價值其實不容小覷，但一度被忽略，評價不高。第四章對此詳加探討，涉及遊仙詩的源起和發展脈略，曹氏父子對待神仙的態度以及他們遊仙詩的創作時間、思想意蘊等諸多問題。

第五章至第七章，論述了曹操與建安諸文士的關係、曹氏兄弟爭嗣本末及其影響。之所以挑選這兩個話題，首先是因為它們的牽扯面廣，吳、蜀作家除外，幾乎所有的比較重要的建安文人的生平事迹或文學創作都會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其次是因為它們形散神聚，合而觀之，可以看出曹氏父子與建安諸文士的關係、往來和糾葛。最關鍵的是因為個人認為這兩個話題比較重要，並且有話要說。通過前者，主要是想糾正這一話題上存在的誤解；通過後者，主要是想深化對這一話題的認識。

建安文學研究所取得的具體而巨的成就，讓試圖涉足這一研究領地的後生在歡欣鼓舞的同時，也生生不逢時、難以插足之歎。拓荒不成，只好不辭勞苦，在別人耕耘過的土地上作進一步的深耕或精耕細作，庶幾不會兩手空空。期於略有新意是本書的指導思想，因而不甚注重框架體系的系統細密，也不刻意追求面面俱到。儘管如此，對建安文學研究領域的一些重要論題，文中還是多多少少有所涉及。或述多而論少，或述少而論多，或暢其顯明，

或發其幽微，有話則長，無話則短。有一說一，不人云亦云，我遠遠沒有做到，但至少主觀上是這樣努力的。由於貪圖把平時的一些讀書心得盡可能多地穿插在正文或注釋裏，行文時不時會由此及彼，略顯臃腫和游離。

第一章 建安文學批評史論（上）

第一節 曹丕建安文學批評新探

所謂「建安文學批評史」中的「建安文學批評」，指的是對建安文學的批評；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建安文學批評」，指的是建安時期的文學批評。無論論及哪一種批評，都不能不首推曹丕，《典論·論文》賦予了他這種首屈一指的地位。

對《典論·論文》的探討，主要是從「建安時期的文學批評」的意義上進行的。為了儘量將它納入現代文學理論的框架體系，今人往往將其肢解為「文氣」說、文體論、作家論以及對文章地位和價值的看法等，這是無可非議的，但也模糊了它渾然一體的本來面目。

《論文》伊始，曹丕指出「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的現象，並對這種現象形成的緣由略加分析；接著引出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七子」，亦即後世所謂「建安七子」^[註 1]並駕齊驅誰都不願服輸的事實；然後提出「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開宗明義，交代了自己寫作《論文》的動機，就是有感於古今文人容易「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有「不自見之患」，而欲人去此病累。隨後，曹丕對「七子」一

[註 1] 或以「七子」有曹植而無孔融，皎然《詩式》：「鄴中七子，陳王最高。」劉昫《舊唐書·元稹白居易傳論》：「昔建安七子，始定霸於曹、劉。」許學夷《詩源辨體》卷四：「(曹)植與(王)粲等六人，實稱建安七子。」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二：「建安七子，除陳思，其餘略同。」丁晏《陳思王詩鈔原序》：「(曹植)為建安七子之冠。」

一加以評說，指出他們的優劣短長，上承「文非一體，鮮能備善」之分析，下啓「四科不同」之論述，言下之意，「七子」也是偏能而非「通才」，而「文氣」說則是對「七子」文章不同體貌風格的成因的追尋。最後，曹丕談到文章的功用，而以徐幹著《中論》「成一家言」作結，這不是偶然的，徐幹正是他所講的以「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而「不朽」、「聲名自傳於後」的例證。可見，《典論·論文》在體系上是氣脈貫通的，它本是針對「七子」之文展開的評論，從「對建安文學的批評」的意義上來探討它，更符合曹丕創作的初衷。

見解獨到的「文氣」說、文體論其實是曹丕「建安七子」論的副產品，它們得到了學術界較為充分的研究，而和建安文學研究最為切近的，曹丕對於「建安七子」的同樣精到的批評，還存留開掘的餘地。孔融之外，有關其他六子的批評還見於曹丕《與吳質書》中，可以與《論文》互相參證。

曹丕評徐幹之賦「時有齊氣」，《文選》李善注：「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評王粲之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李善注：「弱，謂之體弱也」；評應瑒「和而不壯」；評劉楨「壯而不密」，「有逸氣，但未遒耳」〔註2〕；評孔融「體氣高妙」；評陳琳「章表殊健，微為繁富」。綜合這些評論，我們可以看出曹丕論文的價值取向：重氣，以壯大遒勁為美。這對儒家正統的以舒緩和平為上的審美趣味而言，不能不說是一個突破。

在褒揚劉楨能「壯」、陳琳能「健」的同時，曹丕也指出他們「不密」或者「繁富」的缺失。〔註3〕《文心雕龍·諧隱》篇云謎語一體，至曹丕、曹植，「約而密之」。「約而密之」，恰可借用來作為曹丕論文旨趣的另外兩個方面。說曹丕尚「約」，比較容易理解，這是與他重氣好壯的宗旨分不開的。一般來說，文辭煩冗，易流於舒緩；簡要，則容易凸現骨力，顯得意氣駿爽。說曹丕尚「密」，則不大容易獲得人們的認同，因為劉勰曾以「不求纖密之巧」〔註4〕來評建安詩歌。實際上，劉氏此論乃是針對劉宋以來的文體流弊有感而發，相比較而為言。〔註5〕「密」是劉氏所欣賞的，對行文縝密的王粲，他不止一次地褒揚過：

〔註2〕《文選》呂延濟注：「遁，盡也。言未盡美矣。」未確，今人多不從。

〔註3〕鍾嶸《詩品》評劉楨：「氣過其文，雕潤恨少。」何焯《義門讀書記·文選》評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文甚凡冗。」可為曹丕之論作注腳。

〔註4〕《文心雕龍·明詩》。

〔註5〕參本章第二節。

《文心雕龍·詮賦》篇：「仲宣靡密。」

《論說》篇：「仲宣之《去伐》，……鋒穎精密。」

《才略》篇：「仲宣溢才，捷而能密。」

可以說，文章，尤其是書論體文章，遣詞造句要力求綿密，是漢魏之際一些文人的自覺追求之一，也是曹丕相當注意的一個評判標準，對孔融的評論也可以說明這一點。《論文》譏貶孔融「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以嘲戲」，有人認為曹丕挾有個人私恨，因為孔融曾經幾次三番地嘲諷其父曹操。這種見解貌似有理，實則不然。檢《文心雕龍·論說》篇，亦有「孔融《孝廉》，但談嘲戲，……言不持正」云云，與曹丕之說並無二致，不知論者當作何解！曹丕若懷嫌怨，不至於在孔融死後以金帛募其文章。蓋「書論宜理」，間雜嘲戲，雖別開生面，本非正格。《漢書·東方朔傳》：「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就已經把詼諧嘲弄與不能持論連帶而言。觀孔融《嘲曹公爲子納甄氏書》、《嘲曹公討烏桓書》，有似信口開河，不過藉以泄其私憤而已。《難曹公表制酒禁書》一文，詼諧流靡，可玩而誦，而析理不「密」，有似強詞奪理，正所謂「理不勝辭」者，與曹丕論文意趣不符，因而不予首肯。孔融好發議論，《後漢書》本傳稱「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而《三國志·崔琰傳》注引《續漢書》卻說「融持論經理，不及（邊）讓等」。也足徵孔融「不能持論」，絕非曹丕一己之私見。況且，對孔融書論，曹丕並沒有一筆抹殺，稱頌「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辭賦一體，曹丕以王粲爲冠冕：「仲宣獨自善於辭賦」，「王粲長於辭賦」；以徐幹爲稍次：「粲之匹也」；其餘諸子，都不置一詞。影響所及，在《文心雕龍·詮賦》篇裏，所有的建安文人，也只有王、徐二人在魏晉「賦首」之列。王粲辭賦，稱美於後世，陸雲《與兄平原書》已有「《登樓》名高，恐未可越」之歎，但畢竟詩名更甚。至於徐幹，雖詩才平平，猶有數首，如《室思》、《雜詩》、《答劉公幹詩》等，爲後人所玩賞，劉勰之外，卻鮮有稱道其辭賦者。曹丕唯讚譽二子辭賦，並明言「然於他文，未能稱是」，對包括詩歌在內的其他文體，無所推許，這不僅與今人評述偏重詩歌大異其趣，就是與古人舊評相比也頗有參差。孔融難得其詳，曹丕與其他六子都相知甚深。陳琳代曹洪作書給他，一眼就被他看出。^{〔註6〕}他的評價，我們固然不能盲從，

〔註6〕 曹丕《敘陳琳》：「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按指曹洪）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詞，知陳琳所敘爲也。」